



一代文宗 传风神

2012年欧阳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刘德清 丁功谊 主编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一代文宗 传风神

2012年欧阳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刘德清 丁功谊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文宗传风神：2012年欧阳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刘德清, 丁功谊主编.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 6

(庐陵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0 - 06463 - 3

I . ①—… II . ①刘… ②丁… III . ①欧阳修(1007 ~ 1072)

- 人物研究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 ①K8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6190 号

书名:一代文宗传风神 : 2012 年欧阳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刘德清 丁功谊主编

责任编辑:吴艺文

封面设计:关 科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470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50 千

ISBN 978 - 7 - 210 - 06463 - 3

赣版权登字—01—2014—23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48.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 前言

一代文宗欧阳修，平生著书撰文，总爱自署“庐陵欧阳修”。他的籍里是吉州永丰县沙溪镇，古今素无异议。然而，他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长于随州（今属湖北），历官多在两京（今河南开封、洛阳），出任地方官全在江北，晚年致仕，定居颍州（今安徽阜阳），死葬河南新郑，终其一生，有文献可征的籍里之行，恐怕只有一次，即皇祐五年（1053）八月间扶护母丧南下归葬。或许是顾虑到身后的籍里之争，垂暮之年，他亲自考订谱系，编撰《欧阳氏谱图》，连同精心改就的《泷冈阡表》，一并书碑刻石，树立在故里父母坟茔之前。

其实，欧阳修故里庐陵郡，在其生前已经定称吉州，元明清时代又改名吉安。然而，这里的文人学士，出于历史上惯有的崇古心理，总还是称其乡贯为“庐陵”。而作为庐陵首席乡贤的欧阳修，也始终深受乡人的爱戴与缅怀。在古庐陵郡治，即今天的吉安市吉州区，自宋代以来，一直建有欧阳修祠寺。早在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吉州知州方时可就在州治府右街兴建“六一祠”。63年后，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吉州知州方崧卿见“六一祠”已圮毁，领头捐资修建“六一堂”。宁宗嘉泰三年（1203），胡守衡出任吉州知州，又在



府治内重修“六一祠”。据《吉安府志》记载，南宋末年，吉州知州李芾在郡城南建造“忠节祠”，祭祀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等庐陵五贤。明宣德年间重修，增祀文天祥。此后，“忠节祠”不断修葺，不断增祀，至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共祭祀欧阳修以下44位乡贤。宋元以降，庐陵各县地也先后建有“九贤祠”、“双忠祠”“三忠祠”“七忠祠”“四先生祠”等，欧阳修始终名列其中，而且居祭祀之首。在吉州永丰县，欧阳修祀祠尤为常态，县治恩江镇小西门外的葛溪上，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就建有一座三拱古石桥，命名“六一桥”，历经宋元明清各朝代，屡经修葺，保存至今。六一桥畔，先后有过石桥庵、石桥寺、六一寺、六一书院等建筑，都是纪念欧阳修的建筑物。相传当年文天祥率领勤王军经行永丰时，曾为六一桥书有“柱石”二字，后人刻石置于石桥庵，庵寺后来改立书院，奉安欧阳文忠公牌位，岁时祭祀。在永丰县沙溪镇，早已有享负盛名的西阳宫，欧阳修生前托付其看护父母坟茔，死后改为欧阳修父母坟院。自古以来，人们将“西阳宫”“欧阳文忠公祠”“泷冈阡表碑亭”，视为西阳宫建筑群。它与近在眼前的欧阳修父母合葬墓及胥、杨二夫人坟茔，千百年来，已成庐陵人对乡贤欧阳修的追思地。

再就欧阳修著作版本而言，庐陵自古以来就是精品《欧集》的产地。南宋绍熙、庆元间周必大吉州刻本《欧阳文忠公集》自不待言，这是公认的宋代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甚或可以说，在《欧阳文忠公集》的千年版本史上，精善之本几乎全都出自欧阳修故里。如明洪武四年（1371）永丰县令蔡玘捐俸倡刻的永丰县学本，洪武十九年（1386）新干曾鲁考异本，天顺六年（1462）吉安知府程宗（江苏常熟人）翻刻本，弘治五年（1492）吉安知府顾福（江苏苏州人）校补重修本，正德六年（1511）吉安知府刘乔（浙江慈溪人）校刻本，嘉靖十六年（1536）吉安府司马季本（浙江绍兴人）的刊校重修本，清康熙十一年（1672）庐陵曾弘的白鹭书院刻本，乾隆十一年（1746）庐陵钓溪欧阳安世的“孝思堂”本，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惇叙堂重刊欧阳安世本，嘉庆二十四年（1819）庐陵钓源欧阳衡的新编校刊本。此外，还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奉使江藩行人司行人陈珊（贵州铜仁人），取吉安刻本订讹校刻的《欧阳文忠公全集》135卷本，嘉靖三十六年（1557）江西抚都院何迁（湖北安陆人）对刘乔、季本《欧阳文忠公全集》的递修本，以及清道光十四年（1834）庐陵钓源欧阳杰《欧阳文忠

公毛诗本义》等刻本,乾隆十一年(1746)安福泰山欧阳徽柔《五代史记》等刻本。这些出自庐陵的欧阳修著述刊本,在欧阳修著作版本系列中,占据举足轻重的突出地位。

又就欧阳修研究而言,千百年来吉安的学者文人始终保持对首席乡贤的热忱与关注。周必大率领乡人孙谦益、王伯刍、丁朝佐、曾三异、罗泌、胡柯等,辛苦六载,广搜旁采,详考精校,汇编刊行《欧阳文忠公集》153卷,个中的敬贤爱乡之深情,可想而知。在杨万里《诚斋集》、刘弇《龙云集》、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王庭珪《卢溪文集》、刘将孙《养吾斋集》、欧阳玄《圭斋集》、杨士奇《东里全集》、解缙《文毅集》、胡广《胡文穆公集》等庐陵籍文化名人的别集里,涉及欧阳文忠公生平著述、文化遗存的诗文,如像赞、评述、题跋,谱序、祠堂记等,可谓不可胜计。而在孙奕《履斋示儿编》、罗大经《鹤林玉露》、王霆震《古文集成》等笔记杂著中,有关欧阳修生平、思想、著述的逸事、评点、考证等文字,也是屡见不鲜。改革开放后,地处欧阳修故里的井冈山大学,始终重视对历史文化名人欧阳修的研究。早在1997年10月28日至30日,为纪念欧阳修诞辰990周年,学校召开了“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来自14个省市76位“欧学”研究工作者,就欧阳修的为人为政、为学为文展开热烈讨论。会议收到论文63篇,最终遴选42篇,汇编成《庐陵文章耀千古》,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有史以来“欧学”研究工作者的首次相聚,也是“欧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盛会,它对后来国内外“欧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007年8月6日,正值欧阳修千年诞辰,欧阳修故里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有中国散文学会主办,中共永丰县委、永丰县政府、井冈山大学具体承办的“纪念欧阳修诞辰10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国台湾、香港及日本等地的80多位专家学者,再次聚会欧公故里,就欧阳修生平思想、文学创作与学术著述,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讨。大会期间,成立“中国欧阳修研究中心”,决定出版《欧阳修研究》丛刊。因为后来永丰领导层变动,加之《欧阳修研究》稿源不足等多种因素,有些蓝图未能实现,但是,坐落在欧阳修故里的井冈山大学,先后获取“江西省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江西省高校文科研究基地”“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等学术平台,“欧



学”研究仍在有序而深入地开展。

2012年8月24日至26日,由中国欧阳修研究会、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永丰县欧阳修纪念馆发起,又一次在井冈山大学召开欧阳修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校教授、科研院所研究员、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编审,以及日本、香港地区学者,日本学者东英寿先生向大会报告新发现96篇欧公散佚书简之始末,引发与会专家兴趣与关注。会议收到论文35篇,今从中选择31篇,辑成此编,以飨读者。

历史文化名人欧阳修,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他深刻地影响了北宋文学、史学、经学、政治、思想等诸多领域。他又是中国古代学者型政治家的杰出代表,在为人、为政、为学、为文等方面,建树起封建太平时代文人士大夫立身行事的光辉典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期,大凡是盛世崇文的太平时代,如北宋元祐年间、明朝成宣时期、清朝康乾时代,文坛无不崇欧,文人士大夫无不学欧,甚至连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也亲自推崇、评点欧阳修文章,借用历史文化名人欧阳修的“文章道德”,砥砺士节,激励士风,端正世风民俗,追求公平正义与清廉和美。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注意、值得深思的现象。如今的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文化多元时代,全社会呼唤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呼唤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道义担当,呼唤文化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民生康乐与社会和谐。为完成这一伟大的时代使命,曾是中国历史上传统道德匡扶者,文化创新领头人,宽简政治践行家的欧阳修,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作为欧阳修故里的庐陵人,我们应该远绍欧阳修、文天祥等先贤风范,近承井冈山先烈的革命精神,积极进取,努力创新,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刘德清 丁功谊
2014年5月18日



目
contents
录

目
录

北宋中期文化生态与欧阳修	陈冬根	1
试论欧阳修辞赋的美学特色	邓声国 叶静	17
人情与礼制的冲突——濮议中的欧阳修	丁功谊	31
民间流传欧阳修之佚文《郭氏族谱序》献疑	顾宝林	45
东英寿教授新见欧阳修散佚书简解读	洪本健	54
欧阳修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黄惠运	71
欧阳修与文房四宝	姜赵玉莲	81
遗恨千载说《范碑》	李丛昕	91
欧阳修与巴蜀文化	李德书	108
明清曲谱中的欧阳修词乐谱	李俊勇	114
群体角色和使命:欧阳修书简中的文人思想	李 强	123
再论欧集整理暨底本选择	李逸安	136
论欧阳修的民本思想	廖高翔	144

欧诗断论	刘德清	155
欧公居滁无乐考	刘向荣	167
欧阳修与茶酒文化	刘文传	176
论欧阳修的“圣贤情结”及其影响	刘越峰	187
欧阳修远佛亲道倾向与晚年出儒入道论	吕肖奂	196
试论欧阳修词对前人诗句的化用	欧阳明亮	209
欧阳修祖父欧阳偃身世辨疑	欧阳勇 陈元	219
欧阳修的四六文认同与变体的发生	阮 忠	226
欧阳修《丰乐亭记》的思想蕴涵	唐晓敏	238
欧阳修与宋初理学思潮	王法贵 张铉	243
从欧阳修诗文看北宋时期宜昌地区的风土人情	王前程	252
欧阳修与颍州	王秋生	260
略论欧阳修对陶渊明的推崇及其政治意义	吴国富	280
欧阳修碑志类古文的书写艺术	熊礼汇	294
欧阳修西湖鼓子词《采桑子》经典性论析	郁玉英	317
论欧阳修的迟暮意识	曾 敏	326
论欧阳修身后诗歌影响迅速减弱的现象及其原因	张明华	335
欧学札记二题	张 铉 裴新江	348

注：论文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北宋中期文化生态与欧阳修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 陈冬根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欧阳修所处的北宋中期是一个人才荟萃、名家辈出的时代。比如,在文学史上诗、词、文独树一帜而可以为名家者,此时期特别多,而影响深远的所谓“唐宋八大家”此时期占了六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很难再找到一个时代像北宋中期这样辉煌的时期。这种情形的出现,无疑会让许多后世研究者无限追问:为什么北宋中期能够这样集中而大规模地产生文学大家?笔者一直以来也在反复思索这个问题。最后,笔者以为:北宋中期文学成就之所以辉煌耀眼,固然有多种原因造就,但是,其中最为根本的一个原因,应该说是北宋中期良性“文化生态”促成。

有机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关系,可称之为“生态”。任何时代,文学都是在特定时代的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总是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即文学与其存在周围之间的关系,文艺批评中称之为“文化生态”或“文学生态环境”。文学总是在不停与“环境”中的各种系统,诸如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诸方面发生着关系。正如陈兰先生指出:“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生态系统是指以文学活动为



中心,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诸生态因素彼此关联、共振互动的一个整体。”^①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依存的那个“生态”,就是社会文化各要素之间的依存、生发、激励、消长所构成的那个系统。

那么,欧阳修所处的北宋中期的文化生态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呢?这或许不是几句话甚至几篇小文章可以叙述得清楚的。相关的史料可谓是浩若烟海,而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诸多有意义的成果。本文不想再以宏大的叙事视角,从那汗漫的文献资料中进行考证、论述;而只打算以欧阳修及其周围文士的创作活动及相关事迹为例,来揭示北宋中期文化生态的情实及其独特魅力。

从现有研究来看,欧阳修家世并不显赫,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普通,并没有什么特别有助于他日后成为大家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说,四岁即失怙而不得不随寡母依附于叔父欧阳晔生活的境况^②,对于欧阳修的成长来说其实是很不利的条件。但最后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实际领袖,我们不能不认为是欧阳修所处的时代给了他机会,给他提供了成才的条件。换句话说,欧阳修生活在一个文化生态非常好的社会中,正是这个良性的文化生态造就了一代文豪欧阳修。接下来,我们就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论述欧阳修时代的文化生态与文人创作关系问题。

一、文人入仕的黄金时代

谈论北宋文化生态,不能不首先从其制度方面进行考察。正如戴伟华先生说:“中国文学的文化生态研究,表达了文学研究者企图在宏大的文化视野下解释文学生成、发展和演变过程的需求。种族、时代、制度等因素都是研究文化生态与文学要特别关注的几个。文化生态中的时代和制度层的两因素在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③毫无疑问,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就是这个时代

① 陈玉兰《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② 参见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③ 戴伟华《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文化生态最基本的元素,或者说构成这个时代文化生态的底色。

北宋自太祖立朝以来,鉴于中唐以来特别是五代武将乱政的历史教训,特别制定了“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太祖之后,北宋历代皇帝基本都遵循了这个政策。不仅文人不会再轻易因为言行而被杀戮,而且,文人进入朝廷高层、掌握国家权力机构等,已然成为一种常态。即便是作为中央兵权机构的枢密院,也逐步为文官所掌控。^① 在北宋朝文官主政的历史中,欧阳修度过大半生的仁宗时代尤其突出。^② 正如陈峰所指出的:“宋太祖虽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文教及文治的措施,但其目的主要是扭转以往长期失衡的文武关系,以稳定秩序,却并未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崇文’倾向。宋太宗朝后期才开始落实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到北宋中叶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气象。”^③ 这里,我们不妨拿北宋仁宗朝名将狄青一生的沉浮和欧阳修等文士一生的仕履来比较,就可大致窥探出一二。出身寒微的欧阳修最后升到参知政事,成为核心权力圈人物之一;名将狄青一生坎坷,虽亦曾出任枢密院职,但很快被弹劾,最终沉于下位,抑郁而终。欧、狄二人的仕途对比,可以让我们从某个角度看到北宋“右文”之实质。

北宋朝推行的“右文”政策,恰是北宋文人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制度保证。长期稳定的“右文”政策,无疑就是北宋文化生态的良性存在。因为这种政策至少能给文人提供这样几个有利条件或保障:首先,社会普遍重文的风气,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普遍对文人的重视。史料曾经记载:宋人对新科状元和进

^① 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历史上,枢密院作为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始终存在 167 年中,文、武出身的官员先后有 203 人(童贯一人属宦官除外)。其文、武官入职枢密院及其时间长短情况如下:首先,枢密院正职(包括枢密使,知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及判枢密院事等)共 73 人,其中文职出身 54 人,武职出身 18 人,文职出身的占 70% 多;其二,枢密院副职(包括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共 129 人,文职 108 人占总数 83.7% 多;其三,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正职时间约为 91 年,文官与武官同任正职 16 年,两者相加合计 107 年,占枢密院存在时间的 64%;其四,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担任副职 121 年多,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 72.4%。陈峰《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看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② 参看虞文霞《宋太宗“右文政策”与宋代文化昌盛》,《江西社会科学》,1989 年 S5(专辑)。

^③ 陈峰《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0 年第 5 期。



士的围观热情远远大于一般武臣得胜还朝。^① 其次,带来文人们对人生价值或目标的追求,提升文人入仕的积极性。宋代士大夫对国家和社会关注的强烈程度、担当精神、责任意识,不仅宋代以前找不到,即便是宋代以后诸朝代,也鲜有时代能与之并论者。欧阳修所谓“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镇阳读书》)^②就是这种情态的写照。第三,文人士大夫生活待遇的提高。尽管目前学界对宋代文官的俸禄薪资具体情况尚存争议,但承认说北宋文官的生活比较宽裕是没有问题的。按照马克思社会学的观点,人必须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后,才能进行文学艺术等精神创作。宋代文人优裕的生活,自然也就为其进行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二、建功立言的自由时代

人们常常批评宋诗议论太多,即所谓“以议论为诗”。实际上,严羽批评宋人诗歌议论太多,乃是基于对唐诗风韵美的推崇。严羽忽略了宋代诗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文官们的日常生活。宋代士大夫普遍集政治家、学者和文人于一身,因此,关注时事,探讨社会和思索人生诸问题,成为他们的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北宋士大夫们这种议论基本是自由的,是没有太多限制的。很多在前朝文人列为禁忌的话题,到了宋人这里已然可以公开讨论。可以说,宋代诗人们就是生活在一个“议论争煌煌”的自由论争时代。

欧阳修早年名气的获得,就是与其早年特别是景祐(1034—1037)年间作为谏官经历有关,是时的欧阳修不仅敢说敢言,而且能说会论。例如,他在景祐三年为范仲淹鸣不平所作的《与高司谏书》以及《朋党论》等文章,读来令人

^①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云:“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主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之职,赐以朱黻。尔后得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当得之也。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锦鞯绣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倾羨,欢动都邑。洛阳人尹洙,意气横跃,好辨人也。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5页。

不仅震撼,而且畅快。一时间,人人皆在谈论欧阳修,名士蔡襄甚至因此创作《四贤一不肖》诗来对欧阳修等人的事迹宣传。后来,胡宿在《杨察可龙图阁学士、欧阳修可龙图阁直学士制》一文中写道:

具官欧阳某,识远才长,文高行洁。笃于信道,不读非圣之书;忠于本朝,屡条当世之务。并膺左右之选,历宣内外之劳。峻节弗渝,清议弥胜,用进秘图之拜,且光旧物之还。旌乃名臣,敷于茂典,尔身在外,朕心弗忘……①

这是政坛宿老胡宿在替皇帝拟欧阳修任职公文时所作的结论性断语。显然,欧阳修们这种为论国事而言,为求真理而争的行为,获得了上至皇帝、朝臣,下至普通世人的普遍认可和社会舆论支持。这种全社会尚学一致肯定的情形,反过来又大大激发了文人对时事的关注热情和议论的勇气。翻开宋代文人的集子,普遍都有大量的篇章是在争议时事的。尽管有些人的议论也许有些观点偏颇甚至错误,但这却不能否定他们那份忧怀天下的赤子之心。

那种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加上这种自由言说的环境,就大大充实和拓展了宋代文人创作的题材,有了许多可说可写的内容,创作不再是无米之炊、无病呻吟。但凡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事、物,皆可以通过文字写出来。从欧阳修等人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等为人、为政、为学等各方面的情事,都被他们写下来了。如果我们有耐心检阅北宋中期文士们的所有诗文,我们将能看到,几乎所有发生在这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他们的诗文中都能找到相关言说。例如,“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中涉及的方方面面问题,也大部分能从这些文集中看到或找到线索。

三、自由辩论的理性时代

欧阳修等宋朝士大夫不仅勇于发言,而且都是有为而作。他们争论时事,

① 胡宿《文恭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不仅仅是敢于仗义执言,而且贵在真理,决非意气之作。这与前后很多时代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翻阅宋人文集我们可以发现,欧阳修等人在论争国事、朝廷要务时,始终是以“义”字为先,目标是追求真理。这里的“义”含义并不是“义气”,更不是“意气”,而且道义、义理。换句话说,欧阳修们的言行主要是对事不对人,旨在说明道理,解决问题,并不是为了某个人物或者因意气用事而争论。只要其人有错,哪怕是自己的朋友,也毫不客气地批判;即便是自己的对头,只要对方言之有理,也绝不否定对方,也不会借故打击。这样的情形在欧阳修时代特别是真宗、仁宗几朝表现尤其突出。

例如,景祐至庆历初的前后一段时期内,在政治上,欧阳修无疑是与范仲淹、杜衍他们站在一边,而与吕夷简、王拱辰、高若讷等人对立。但是,作为谏官言官的欧阳修等人,并没有在政治上一味袒护范仲淹、杜衍等人,也没有一棍子打死王拱辰、高若讷等人。这不妨看看范仲淹给皇帝的一篇奏议中所写的文字,他说:

臣叨膺圣寄,充前件职任,即日沿边巡按。其有将帅之能否,军旅之勇怯,人民之忧乐,财利之通塞,戎狄之情伪,皆须广接人以访问,复尽心以思度,其于翰墨,无暇可为。而或奏议上闻,军书丛委,情须可达,辞贵得宜,当藉俊僚,以济机事。臣访于士大夫,皆言非欧阳修不可,文学才识为众所伏,往者缘臣之罪,有黜朝听,盖本人素好议论,闻于搢绅,只如臣为谏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修皆曾移书责臣等缄默无执,非独有高若讷之让也。以此明之,实非朋党。若讷知其无他,亦常追悔。臣切于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见权滑州节度判官,伏望圣慈特差充经略安抚司掌书记,随逐巡按所典书奏。^①

从范仲淹这封书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初欧阳修为范仲淹贬谪之事严厉抨击身为谏官的高若讷,完全就是对事不对人。尽管欧阳修的谴责语气非常尖锐,但欧阳修只是在谴责高若讷作为负有言责的人,不能为范仲淹之事仗义执言。

^①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实际上,欧阳修这时期的一系列奏疏,完全是出于一种公心,即对国家的忠心,所谓的大义。所以,对于范仲淹和杜衍,欧阳修也没有认为他们全部都好,甚至曾移书问责过他们。例如,当范仲淹等人重新获得皇帝信任欲委以重任时,欧阳修有一段发言,他说: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昔年仲淹初以忠信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信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①

这里,欧阳修显然没有一味讨好,更没有放弃原则,无限吹捧,而是客观评述,完全从国事出发,理性发言。至此,我们有理由说,欧阳修等人的议论发言,只针对问题,针对事件,并不针对个人。他们只求真理,只求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不是党同伐异之举。

这样的文化语境,对于文人创作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十分健康的。因为,欧阳修们无须再忌讳某某人、某某事,而是从现实出发,秉公而为,一切以求真向善为根本目的。如此,他们可以放开言论,尽情抒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这样没有多少拘束限制的自由创作,无疑是最具有活力、最有创造性的。欧阳修等人之所以能在诗词文赋等各种文学样式的创作方面颇有建树,甚至是在文学以外诸多艺术领域中都有所建树,正是得益于这种有利的文化生态语境。

四、互相提携,惺惺相惜

北宋时期的文人们,经常能够互相汲引,相互提携,并不因为一点私怨小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末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



利而相互踩踏、攻击。尽管也存在党派斗争现象,但整体上还是能够体现一种文人惺惺相惜的温情。例如,欧阳修曾经参与宋祁领导的史书编写工作,在工作中欧阳修曾持不同意见,在最后署名问题上,欧阳修也有不当之举。宋祁不仅没有见怪于欧阳修,反而在表奏中称扬欧阳修的功劳。甚至,朝廷授官给他时,他请求以欧阳修自代。宋祁在《授知制诰举欧阳修自代状》中说:

右臣蒙恩授臣依前官知制诰,准敕举官自代者。伏见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欧阳修,志局沈正,学术淹该,栖迟怀宝,不诡所遇,措辞温雅,有汉、唐余风。如得擢在禁垣,委之润色,必且粉泽王度,布于四方。观言责实,臣所不及,愿回授受,以允详求。^①

宋祁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为个人利益和荣誉谋私、毫不犹豫地推荐后生贤俊的精神,恰恰是封建时代乃至当代最为珍贵、最为难得的品格。欧阳修时代有着大批类似于宋祁的士大夫。在欧阳修的成长过程中,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和提携,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晏殊、钱惟演、谢绛、胥偃、范仲淹等。反过来,当欧阳修成长为文坛、政坛重要角色之后,他也帮助和提携了许多文人,如梅尧臣、江邻几、王几道、苏洵、曾巩、王安石、刘敞、蒋之奇、苏轼、苏辙、吕惠卿等。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看看欧阳修对他人的扶持和提携的例子。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在向朝廷推荐王安石等人的奏折中是这样评价王氏的:“伏见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②此时,欧阳修扶持王安石本来是想王氏日后能扛起诗文革新大旗,但后来王安石委婉表示拒绝之后,欧阳修也并没有因此对王氏生嫌隙,依然积极地肯定和推荐王氏。^③如他在嘉祐元年七月的疏状中评价道:“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之才用,所谓无施不可者。”^④正是这种良好的官场氛围,酝酿形成了北宋中期良性文化生态。

^① 宋祁《景文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 欧阳修《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欧阳修全集》,同前引书,第1654页。

^③ 关于欧阳修对王安石提携扶持的问题,有兴趣者可参见笔者《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诗歌互赠再议》一文,《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④ 欧阳修《再论水灾状》,《欧阳修全集》,同前引书,第1663页。